

前现代治边实践与中国边陲社会变迁研究



前现代治边实践与中国边陲社会变迁研究

安介生 邱仲麟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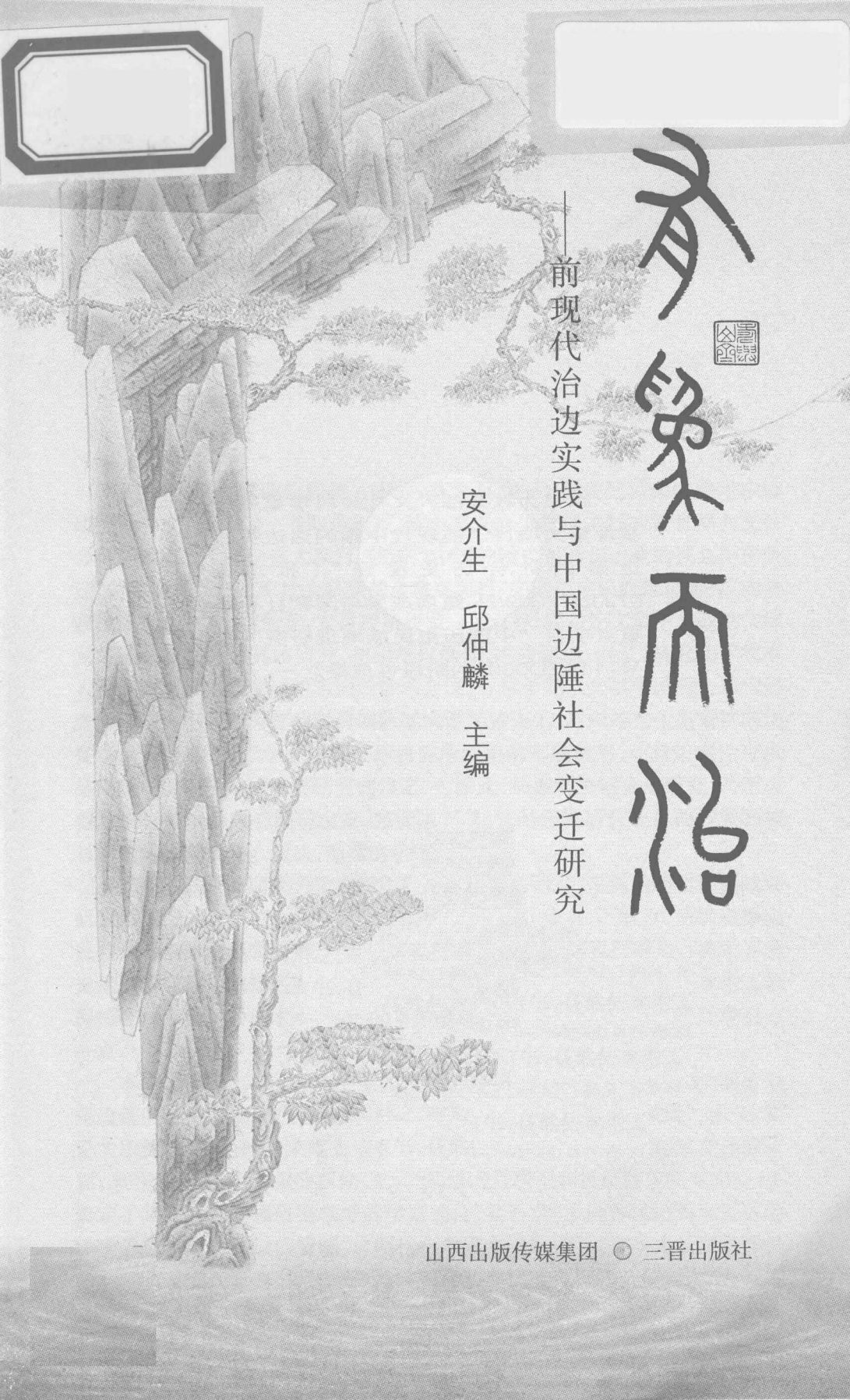
天行健而君子以自強不息

中國化的社會實踐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研究

李永智 鄧世華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北京



前现代治边实践与中国边陲社会变迁研究



前现代治边实践与中国边陲社会变迁研究

安介生 邱仲麟 主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前现代中国的治边实践与边疆的社会历史变迁”(批准号:07JJD770095)结项成果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研究”(批准号:11AZD05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序言：边疆研究中值得关注的视角

李大龙

安介生、邱仲麟两位教授主编的《有为而治——前现代治边实践与中国边陲社会变迁研究》一书即将出版，该书是安介生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前现代中国的治边实践与边陲的社会历史变迁”的结项成果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出版前夕，安教授命我做一下点评，因对论文集集中多数论文涉及的选题没有做过具体研究，初感难以胜任，本应谢绝，但是，最近几年我本人曾经数次参加其课题组组织的学术会议，有感于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安介生教授为首的科研团队继承谭其骧先生、葛剑雄先生所秉持的优良学术传统，致力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而且边疆治理也是构建中国边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因此，从推动边疆史地研究，乃至边疆学学科建设的内心愿望出发，虽能力不及，还是想就研究项目的开展和相对熟悉的论文谈一点看法，推荐给学界。

安介生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是国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领域的开创者之一，其《历史民族地理》一书（分上、下册）可谓国内历史民族地理整体性研究的奠基之作，而另一位主编邱仲麟教授则是台湾学界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知名专家，著述颇丰，二位合作主编本书，自然使本论文集保持在一个很高的学术水准上，论文集收录的论文情况已经能够充分说明这一点。

本论文集分上、下两篇，上篇为“政治与制度篇”，共有 12 篇论文，集中讨论边疆的政治制度、政区形态和社会变迁；下篇为“经济与区域篇”，由 15 篇论文所构成，讨论的对象则集中在边疆民族分布、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等方面。就作者队伍而言，据我所知，刘祥学教授是以《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史》一书奠定了其在明代边疆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其所撰“中国古代边疆地区的地域形象及对边防建设的影响”、“明代驯象卫考论”、“明以来岭南地区壮族的地理分布及变迁研究”等文章依然将明代边疆民族地区作为研究对象；郑维

宽教授则擅长于边疆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其所撰“边界形成与边疆维护:宋代中越关系变动下的岭南边疆治策探析”、“明代广西的地缘政治格局与治边策略研究”、“历史地缘政治背景下广西政治中心的选择与分省设想”、“边疆危机与行政应对:中法战争后清政府的西南治边策略探析”数文是以西南边疆,尤其是广西地区作为关注与探讨的对象。樊如森副教授的“清代民国西北牧区的商业变革与内地商人”、“‘赶大营’——近代天津商人与西北经济开发”则将研究目光放在了西北地区经贸发展与社会变迁之上。

井黑忍博士、岛田美和博士二位日本青年学者的加入,同样使本论文集增色不少。井黑忍博士是安教授的好朋友,同样关注于中国山西及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历史地理变迁,所撰论文“流域的分开与结合——以黑河流域平天仙姑信仰为中心”视角独特,分析到位,意味深长,反映出他对于中国边疆地区研究的深厚造诣。岛田美和博士的论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移民开垦事业与学术界的關係”同样选取了一个非常新颖的视角,表现出她观察的细心与思考的缜密,令人读后印象深刻。

安介生、邱仲麟二位教授,既是主编者,也是主要的作者。安介生教授有“略论先秦至北宋秦晋地域共同体的形成及其‘铰合’机制”、“略论明代山陕地域共同体的形成——基于边防、区域经济以及灾荒应对的分析”、“历史民族地理之‘界域’研究——以地处川、青(藏)、甘之交的松潘地区为核心”、“政治归属与地理形态——清代松潘地区政治进程的地理学分析”、“晋学研究的‘区位论’”等五篇专论,均堪称力作。而邱仲麟教授则有“西皮与东皮——明代蒙古与辽东地区毛皮之输入”、“明清晋北的山地开发与森林砍伐”两篇专论,引征之翔实,令人叹服。虽然对于《有为而治——前现代治边实践与中国边陲社会变迁研究》收录的全部论文难以做出具体的点评,但是还想就该著作选题的取向,尤其是安介生教授的数篇专论体现的独特研究视角(即区域视角)谈一点愚见,权作读后的感悟。

安介生教授的两篇专论,都以“地域共同体”为名,其他各文也多以某一个地理区域为研究范围,其中更以安教授的故乡山西所占权重为多,由此让我联想到了“边疆”这个概念以及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边疆”,或称之为“边地”,是相对于统治核心地区而形成的概念,因此“边疆”既是一个地域性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性概念。边疆是一个王朝或政权疆域的外围地区,依托于政权而存在,因而不同政权的边疆涵盖的范围也有差异。山西、陕西今天似乎已不属边疆之地,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无疑可归为“边地”的范围。对于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而言,边疆具有两个特点:其一,边疆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同时期边疆涵盖的范围有着很大不同,一般而言,其涵盖的范围呈现向外拓展的趋势,伴之而来的是王朝或政权

对边疆的统治方式不断“内地化”，而直接统治区域不断向外延伸，从而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的疆域形成和发展留下了清晰的发展轨迹。其二，边疆虽然是多民族分布和聚居的地区，但和“中国”仍然是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无论是先秦典籍《礼记·王制》所言“中国、戎、夷五方之民”，还是唐人所言“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①，都将居于中原地区的汉人和主要分布于边疆的“夷狄”之人视为王朝疆域——“天下”的主体，而正是这两大族群共同推动着中原和边疆逐渐融为一体，促成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

在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边疆的“内地化”，自然是一个应该给予关注的选题或研究视角，但治理方式的“划一”只是融为一体的开始。安教授的《略论明代山陕地域共同体的形成——基于边防、区域经济以及灾荒应对的分析》一文虽然主要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对山陕地域共同体的形成做了系统分析，但其结论中有如下论述：“相邻地域能否形成幅员更为广大的地域共同体，更取决于时间的维度，即由共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演化过程所产生的趋向与趋同，而人们的心理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趋向与趋同的长期累积。”实际上，这一认识并不仅仅适用于对地域共同体的研究，对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也有很多启示。

众所周知，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实现了对六国的统一，建立起秦王朝，其后为了王朝统治的需要，放弃了分封制度，代之以“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对中原地区实施直接管理，之后又将郡增加到四十余个，从而结束了中原地区诸侯分立的局面，实现了治理方式的“划一”。与此同时，为了维持这种“划一”的治理方式，又在“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辽阔地区，实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②但是，治理方式的“划一”，只是形成“共同体”的第一步，而能否使辽阔的区域成为“共同体”，也要取决于安教授所说的“时间的维度”。从后来历史发展的轨迹看，即便是在秦王朝设置的郡县区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为一体，也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刘祥学教授所关注的中国南部和西南部民族地区而言，虽然在秦汉时期这一区域就实现了郡县化的统治方式，但至元代依然尚未达到古人所希望的“九州攸同”，故而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设置了有别于中原地区的土司制度对该地区进行管理。明朝尽管沿用了土司制度，但是积极致力于儒家文化的传播，为其后清朝的改土归流，为南部和西南部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真正融为一体提供了基础。应该说，多民族

① 《旧唐书》卷六二《李大亮传》。

②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国家——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的轨迹,即体现了安教授所说的“共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演化过程所产生的趋向与趋同”,而多民族国家——中国构建的最终完成,也取决于人们的心理认同,而“人们的心理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趋向与趋同的长期累积”。今天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就是历史上活动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民族,包括现在的56个民族和已经消失的众多民族共同“认同”的结果。

对于主导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这种“认同”,一些国外学者难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已经注意到了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参与对“中国正统”的争夺,并最终和中原汉族融合的行为,但是,他仅是从游牧“政治体”的视角来分析,所以其得出如下结论就不足为怪了:

在这些袭击的门槛边(此处是草原的尽头和耕地的起点),他瞥见了与他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将唤起他的贪婪的生活方式……一年中的其余时间,特别是冬季,游牧民的目光都是转向南方温暖的土地,在西南方是向着伊塞克湖,即“热海”;在东南方是向着黄河流域肥沃的黄土地。并不是说他要尝试着像对待耕地一样地耕种土地,当他占有耕地时,他本能地让它处于不生产的休闲状态,土地变成了草原,为他的羊群和马群生产牧草……然而,从游牧民中有时也会产生杰出的人物,他及时得知定居帝国的腐朽状况(这些狡猾的野蛮人像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人一样非常熟悉中国帝国宫廷内的拜占庭式的阴谋)。他将与中国的一派或者一个王国签订盟约以反对另一派,或者与篡位失败者签订盟约。他将宣布自己及其部落是帝国的盟邦,在保卫帝国的借口下进入帝国边境地区,在一代或两代之后,他的孙子们已充分具备了中国人的外表,采取了大的行动,泰然自若地登上天子的王位。在这一方面,13世纪的忽必烈的功绩只不过是4世纪的刘聪和5世纪的拓跋人的重复。又过二、三代后(如果不被某次民族起义赶出长城的话)这些中国化的蛮族们除了丧失蛮族性格的坚韧和吸收了文明生活的享乐腐化外,从文明中一无所获,现在轮到他们成为蔑视的对象,他们的领土成为那些还留在他们土生土长的草原深处的、仍在挨饿的其它游牧蛮族垂涎的战利品。于是,上述过程又重复出现。在5世纪,拓跋人站在匈奴人和鲜卑人的肩上消灭了他们,并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在12世纪,在契丹人(一支完全中国化的蒙古人,自10世纪以来他们就是北京的和平的君主)的北面,女真人崛起,他们是通古斯人,几

乎还处于原始状态，在几个月之内他们夺取了北京城，结果轮到他们受到中国的影响，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直到恰好一个世纪以后被成吉思汗灭掉。^③

勒内·格鲁塞应该说是已经明确看到了游牧和农耕两大族群之间的有规律的互动关系，所以得出“上述过程又重复出现”的结论，但是，他将游牧族群看成了“独立”的整体，试图从游牧民族国家的视角去审视这种互动，自然不能理解这种“重复”的意义，难以给出准确的解释也是很自然的。实际上，从匈奴人刘渊建立汉国、鲜卑人建立北魏、契丹人建立辽、女真人建立金来看，尽管过程看似“重复”，但每次实施“重复”行为的对象不同，“重复”的内涵以及政治和族群环境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这种互动带给游牧和农耕族群的内在变化是巨大的，不仅促成了族群的重组，而且“中国正统”观念也得到了更多族群的认同，多民族国家自然凝聚的过程就是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不断向前迈进的。如“五胡十六国”时期，建立汉国的虽然以匈奴人为主导，但是也凝聚了汉、鲜卑等其他族群；而南北朝时期建立北魏的主体，则是凝聚了拓跋、慕容等其他鲜卑各部之人，而且政权构成中也有大量汉人存在；契丹、女真也是在整合草原众多游牧部落的基础上建立辽、金两个王朝，其对农耕地区的治理则也是依靠汉人。这些由游牧族群主导的王朝尽管构建起了涵盖农耕地区和农耕族群的疆域范围，但却并不是以“外来者”的身份出现^④。他们同样认为自己是“中国正统”，是以前王朝的继承者。期盼将南部更广大农耕区域纳入“大一统”之中，是这些王朝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共同理想。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史历经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但是，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历程却没有中断反而一直持续着并最终得以完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 60 年以来，我们习惯于用“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来描述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国内已经出版的相关著作大多概莫能外，而实际上自近代以来虽然我国学术界倾力在构建多民族国家历史体系，但只是在对中华民族的建构上取得了一定成果，而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却一直难以摆脱“王朝国家”的束缚，没有构建出一套成熟的关于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更别说是为国外学界认同了，在这方面，安介生教授、邱仲麟教授主编的《有为而治——前现代治边实践与中国边陲社会变迁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和思路。

③ [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15—17 页。

④ 这些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虽然有一个被汉人接纳的过程，但是，最终记载这些政权历史的史书，诸如《魏书》、《辽史》、《金史》等，都是被后人称为“正史”。

作为以中国边疆研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自建立至 2013 年,也已经有了 30 个年头,在 2013 年由我中心举办的“首届中国边疆学论坛”上,构建“中国边疆学”也成了与会者共同的呼声,可以说,中国边疆研究即将迎来一个新的高潮。我期待着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安介生教授为首的科研团队在积极推动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同时,也为中国边疆学尤其是为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疆域理论研究贡献更多的优秀成果。

目 录

序言:边疆研究中值得关注的视角 / 李大龙 | 1

第一部分 政治与制度篇

安介生:历史民族地理之“界域”研究

——以地处川、青(藏)、甘之交的松潘地区为核心 | 3

安介生:政治归属与地理形态

——清代松潘地区政治进程的地理学分析 | 27

刘祥学:明代驯象卫考论 | 64

刘祥学:中国古代边疆地区的地域形象及对边防建设的影响 | 88

杨晓春:西南夷·西夷·南夷

——解读《史记·西南夷列传》的另一把钥匙 | 100

郑维宽:边界形成与边疆维护:宋代中越关系变动下的岭南边疆治策探析 | 107

郑维宽:明代广西的地缘政治格局与治边策略研究 | 119

郑维宽:边疆危机与行政应对:中法战争后清政府的西南治边策略探析 | 132

郑维宽:历史地缘政治背景下广西政治中心的选择与分省设想 | 148

特木勒:跋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刻本《宣云约法》 | 155

李 嘎:体国经野:雍正年间晋北地区的政区改革与行政经营

——以新设朔平府为例 | 165

李 嘎:边方有警:蒙古掠晋与明代山西的筑城高潮 | 180

第二部分 经济与区域篇

- 安介生:略论先秦至北宋秦晋地域共同体的形成及其“铰合”机制 | 221
- 安介生:略论明代山陕地域共同体的形成
——基于边防、区域经济以及灾荒应对的分析 | 237
- 安介生:晋学研究之“区位论” | 263
- 邱仲麟:西皮与东皮
——明代蒙古与辽东地区毛皮之输入 | 276
- 邱仲麟:明清晋北的山地开发与森林砍伐 | 322
- 刘祥学:明以来岭南地区壮族的地理分布及变迁研究 | 364
- 郝平:明蒙军事冲突背景下山西关厢城修筑运动考论
——以地方志为中心 | 392
- 井黑忍:流域的分开与结合
——以黑河流域平天仙姑信仰为中心 | 408
- 岛田美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移民开垦事业与学术界的关系 | 422
- 胡英泽:清代山陕黄河滩地鱼鳞册研究 | 436
- 张俊峰:从边疆到内地:地方化进程中的边陲社会变迁
——以清代山西河曲县为中心的个案考察 | 456
- 樊如森:清代民国西北牧区的商业变革与内地商人 | 469
- 樊如森:“赶大营”
——近代天津商人与西北经济开发 | 495
- 杨煜达:清代中期滇边银矿的矿民集团与边疆秩序
——以茂隆银厂吴尚贤为中心 | 507
- 王 晗:“界”的动与静:清至民国时期蒙陕边界的形成过程研究 | 524

第一部分

政治与制度篇

历史民族地理之“界域”研究

——以地处川、青(藏)、甘之交的松潘地区为核心

安介生

【内容提要】 松潘地区是中国历史民族地理格局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界域”。作为“界域”的特征之一,松潘地区的历史发展受到客观地理位置与自然地理环境极为明显的影响。同时,松潘地区的民族构成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与历代王朝的关系史错综复杂,可能是激烈争夺的边塞区,也可能是为人所忽略的避难区,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结合历史文献考订与区域地理特征分析,对于松潘地区历史时期民族构成与地理格局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发与说明,以促进学术界对于类似松潘的特殊民族区域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 松潘 界域 民族迁徙

界限或界线在区域地理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早已为中外学者所肯定,没有界限则没有区域(region)。然而,笔者以为:在历史时期区域变迁之中,界线或界限的客观表现形式往往是相当复杂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以泾渭分明、截然分开的单线条形式(boundary line, dividing line)表现出来的,而通常是一个又一个交叉性与过渡性均极为突出的区域。这些区域在属性上并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地理与军事地理意义上的边界地区(frontier),将这些区域进行非此即彼的简单分划,其实都是不准确或是有争议的。笔者将这种区域称之为“界域(dividing areas; dividing regions)”^①。“界域”的研究,对历史地理学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松潘地区,即相当于今天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便是一个在中国历史民族地理中相当典型的“界域”,自然地理与民族分布的过渡性与交叉性非常典型,其在中国民族史及交通史上的重要研究价值,已引起不少民族史研

^① 这一英文译名据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唐晓峰教授建议订正,特此致谢。

究者的兴趣与关注,相关研究成果相当丰富^②。在本文中,笔者以松潘县历史文献资料以核心,试图在总结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于作为“界域”的松潘地区的发展历史作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评述,并着重从历史民族地理的角度探讨其作为“界域”的诸多方面的特征。

一、明代以前松潘地区之民族构成与政区建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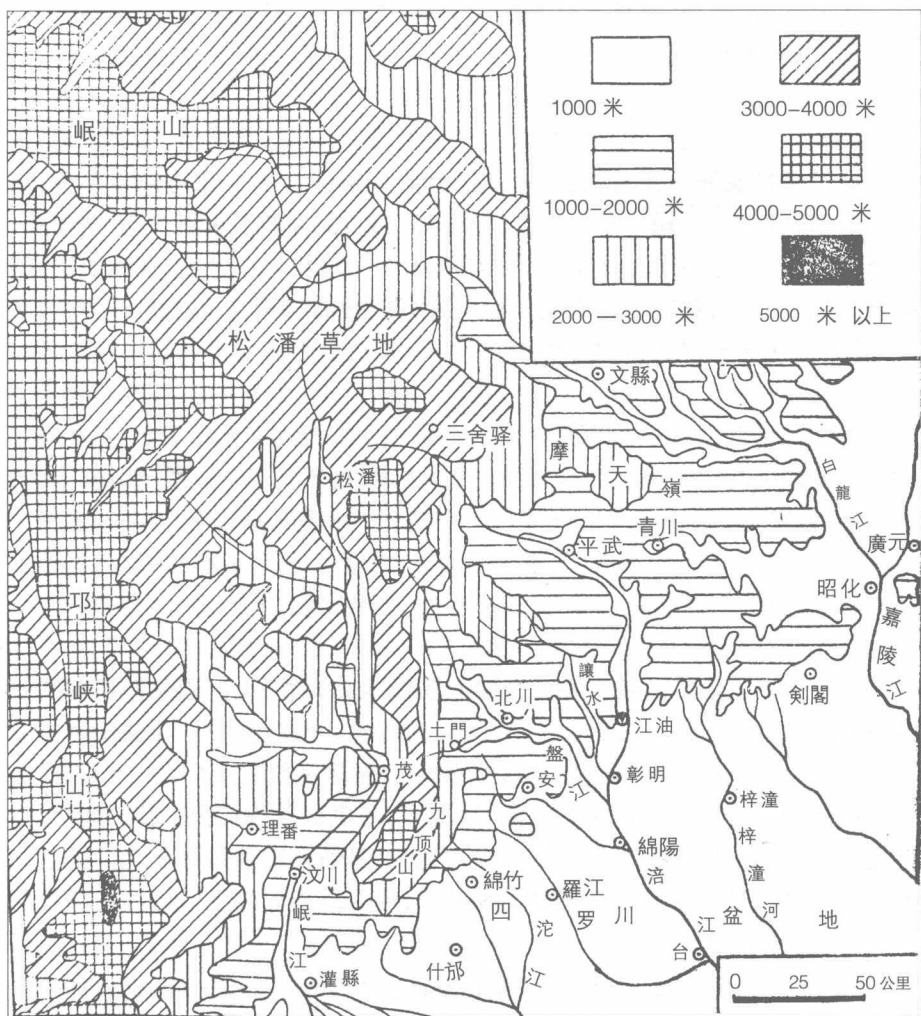
松潘地区自然地貌形态与地理区位均极有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作为“界域”在历史时期区域开发中的轨迹与走向。明了松潘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特征,对于理解松潘地区的历史变迁是非常关键与必要的。对于这一地区的客观地理条件,著名学者严耕望先生曾有相当精辟的论述:“四川西北松潘迤西之草原为西藏青康高原之东南部,由此向东南延伸,与四川盆地相接。四川盆地海拔只在四五百公尺,自盆缘沿岷江而上,愈西北,地势愈高升,至松潘草原地区,海拔高达三四千公尺,其西北岷山、邛崃山脉更达四五千公尺,成为黄河、长江之分水岭。自四川盆地边缘之灌县(即今都江堰市),直线距离不过二百公里,而海拔骤升两千余公尺,故自西北向东南倾斜之坡度极大,致崖谷险峻,河流湍急,为水陆交通之阻。然松潘草原海拔虽高,但地形平坦,为良好牧地,交通并无困难,故自古以来,西北民族与长江流域之交通常取此间而南下……足见陇西地区逾岷山松潘草原南至岷江流域,早有通道也。”^③概括而言,松潘地区处于陇右、巴蜀以及青藏三大地理区域之间,既有独特而显著的地域封闭性(即与周边区之阻隔),但与外界又具有一定交流沟通之条件。既有岷山环抱,又有岷江外流,且毗邻成都平原。在地势地貌上的过渡性同样相当突出。笔者认为:最值得关注的特征,还应是当地不同民族所

^② 据笔者查阅,有关松潘地区历史地理及民族方面的研究成果有:黄盛璋:“清代四川西北省界及其引起的黄河流经四川问题”,《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陈宗祥:“明季《松潘边图》初探——试证图中黑人、白人为两大部落群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沈定平:“明代宣德年间松潘藏族人民起义述论”,《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4期;冉光荣:“略述明王朝在松潘藏区的统治措施”,《中国历史文物》1986年;马勇:“松潘草地部落的历史考察”,《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马勇:“松潘回族源流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任树民:“明代松潘卫‘番人略考’”,《西藏研究》2001年第1期;周伟洲:“公元3—9世纪岷江上游地区的开发及其在交通史上的地位”,卢华语等主编:《古代长江上游的经济开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试论清代松潘藏区的‘改土设弁’”,《民族研究》2007年第6期等等。

^③ 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篇贰伍 岷山雪岭地区松茂等州交通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25页。

居地域具有明显的海拔之差异。如据研究者观察,“汉族人民主要分布在东南二千公尺左右的出产稻米、包谷等的低谷地带,这是本区大城市跟农业村落集中之地,至于三千公尺的高河谷跟二千公尺的山坡出产麦类地带,那就是汉族与藏族杂居地带。三千公尺以上的草原就全是藏民游牧地区。”^④不同海拔地区居住着不同民族的人民,这种特征对于判定川藏交界地区历史时期民族分布的状况能够起到了十分关键性的作用。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地理志》等记载,松潘地区所在汶山郡,本属巴蜀“南夷”或“西夷”之地,西汉时期在总体划归入“西南夷”的范围。汶山郡所辖范围原为蜀郡西面的冉(冉)駹国。“自苻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



松潘地区地势图(引自黄盛璋《清代四川省界及其引起的黄河流经四川问题》)